

大城小镇：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 治理与小城镇发展

李明超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IC & MANAGEMENT PRESS CHINA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智慧城市建设3.0版及其商业模式创新研究”（14J-DCS01Z）、杭州市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杭州市‘城市病’应对策略研究”（20130834M27）资助

大城小镇：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 治理与小城镇发展

李明超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城小镇: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与小城镇发展 /
李明超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096-5447-7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1112 号

组稿编辑: 杨 雪

责任编辑: 杨 雪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董杉珊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8.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5447-7

定 价: 5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1 导 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2 选题意义	9
1.3 研究现状	13
1.4 思路架构	21
1.5 方法创新	26
2 基于历史社会学的城市化进程述论	31
2.1 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31
2.2 城市化的演变与和谐发展	42
2.3 城市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	49
3 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变	59
3.1 二元经济结构	59
3.2 三元社会结构	73
3.3 多元待遇结构	86
4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蔓延与治理	97
4.1 城市病的外在表现	97
4.2 城市病的成因分析	105
4.3 城市病综合诊断与评估	112
4.4 城市病系统治理案例分析	118
4.5 城市病系统治理策略	128



5	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特色化发展	143
5.1	城市新城新区规划与特色城区建设	144
5.2	文化规划与城市生活品质	159
5.3	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发展历程回顾	176
5.4	小城镇的专业化与特色化发展	188
5.5	楼宇经济与城市街区小镇化	197
5.6	土地收益与小城镇特色化发展	213
6	构建系统治理城市病的大城小镇发展模式	223
6.1	“多规合一”与城市空间形态优化	224
6.2	产城融合与城市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230
6.3	特色小镇与城市发展模式创新	256
7	结 语	270
7.1	正视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成本支付难题	270
7.2	破解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成本支付难题	272
7.3	大城小镇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展望	277
	参考文献	281

1 导 论

1.1 选题背景

城市化^①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与工业化进程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资料显示，1900 年世界上只有 13%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07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50%，2014 年达到 54%，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60%，2050 年将超过 70%。从 1950 年到 2014 年，全球城市人口从 7.46 亿人增加至 39 亿人，1990 年全世界有 10 个人口上千万的超大城市，到 2014 年全球有 28 个这样的城市，一共居住着 4.5 亿人口，相当于世界城市人口的 12%。城市用只占地球面积不到 1% 的土地容纳了世界 50% 以上的人口，因此，城市化可谓是近代以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高速推进的城市化一方面给世界各国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引发了诸如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社会问题，给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造成了巨

^①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目前国内学界存在两者混用的状况，官方文件多采用“城镇化”的说法，但也有部分文件采用“城市化”的说法，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则坚持使用“城市化”，比如浙江省。虽然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笔者认为两者作为英文“urbanization”的中文翻译，在终极发展目标上并无差异，城镇化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部分国内学者对西方城市化概念的误读，也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特有的二元现象，即城、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乡改镇和乡镇合并浪潮，导致中国建制镇的实际设置标准和生产要素集中度降低，引发了学界关于集镇、建制镇城乡属性的争论。对于县城的城市属性一般没有争论，引起争议的根源主要在于建制镇的设置门槛和建设标准过低。为避免歧义和争议，本书主要采用比较常用的“城市化”一词。本书认为，从发展的态势来看，城镇化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和过渡性的提法，城市化才是代表城市发展大势所趋的最终目标。



大威胁。反映在卫生健康领域，最显著的特征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城市中慢性疾病、精神性疾病的患者人数显著增加，以各类癌症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从表面上看，慢性病往往是由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所致，但从根源上看，则与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有很大关系，是城市化问题累积导致城市病蔓延恶化的结果。对此，联合国人居署 1996 年 6 月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提出：“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根据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2016 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目前排名前 600 位的主要城市中居住着 1/5 的世界人口，对全球 GDP 的贡献高达 60%，如不进行适当的规划和管理，发展迅速的城镇化会导致不平等、贫富窟和气候变化等社会问题的增长。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克洛斯指出，自 1996 年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以来，世界人口在过去 20 年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规模向城镇迁移。在城市面貌发生巨变的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机遇，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有凝聚力和切实可行的全新城市议程来有效规划未来可持续的发展。^①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中国上演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and 道路选择之争再次出现，其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大量资源要素向东部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导致中国的资源要素空间集聚度太高。展望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国的大城市真的太大了吗？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来人为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依托大规模的小城镇建设让农民就地进城，就能解决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吗？根据反映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诺瑟姆 S 形曲线（见图 1），世界各国城市化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口城市化率在 30% 以下，这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的初级阶段；第二阶段，人口城市化率介于 30% 和 70% 之间，这是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人口城市化在 70% 以上，这是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又趋于缓慢甚至

^① 财政部亚太中心：联合国发布《2016 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EB/OL]. [2017-09-28] <http://iefi.mof.gov.cn/pdlib/dbjgzz/201605/t20160524-2002803.html>.

接近停滞的高度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是一个分阶段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所充分证明,尽管国内有学者认为“城市化在达到 30%后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已经“不足为据”^①。本书将城市化第二阶段即城市化加速期分为城市化前加速期(人口城市化率介于 30%和 50%的发展阶段)和城市化后加速期(人口城市化率介于 50%和 70%的发展阶段),认为城市化后加速期是城市病爆发和蔓延的阶段,各类城市问题叠加出现,会对城市化进程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破坏,必须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需要认真谋划应对策略并加以科学系统的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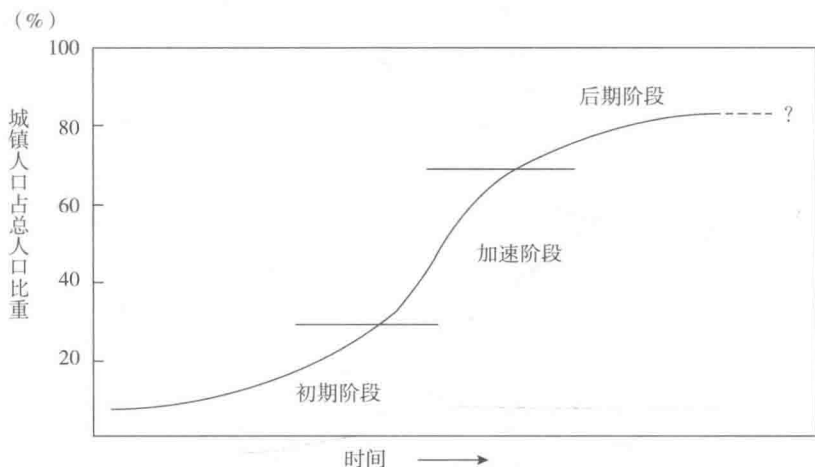


图 1-1 诺瑟姆 S 形曲线图

1.1.1 国际背景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 19 世纪工业化进程中就普遍迎来了城市化的洗礼,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意识到了城市病的存在并率先开展研究。各国学者普遍将城市空间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试图通过构建科学的城市空间规划方案来预防、缓解和治理城市病。以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为开端,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

^① 张京祥. 对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再考察 [J]. 地理科学, 1998 (6) .



盖迪斯的《进化中的城市》、威廉的《小城市空间社会生活》、路易斯·沃思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柯林的《拼贴城市》、盖尔的《人性化的城市》等一大批关于城市发展方向的经典论著相继问世，各种各样的城市病与人性化、自然化、和谐化导向的小城镇成为重点研究对象，规划建设田园城市逐步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力主的舒缓城市问题、破解城市病的“药方”。城市病毕竟不是单纯的空间问题，它还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破解城市病必须系统谋划、科学应对。虽然这些主张在空间层面率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并未成为引导城市发展的主流，世界各国的城市病问题依旧愈演愈烈，但后续的研究者围绕“城市精明增长”、“控制城市蔓延”、“紧凑型城市”等研究主题不断进行拓展和创新，成功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城市繁荣的同时兴起大批田园化特色小城镇。

回顾世界各国城市化历程，城市化演变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流动人口大规模迁徙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未有地冲击了世界秩序和国际版图，战争结束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延续了上百年的殖民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陆续出现了众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赢得民族解放斗争胜利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加快旨在摆脱落后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成为“二战”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时广为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比另一些国家生产水平更先进、生活水平更富裕、经济增长更快速，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劳动比率和储蓄率比较高，人口增长率比较低。传统的增长理论在单一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分析问题，强调资本/产出比率、储蓄率和收入分配份额的稳定状态。这些分析与发展中国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敏锐地捕捉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组织的二元性特征，开辟了二元经济发展分析方法，强调发展过程中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增长趋势而不是稳定状态。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现代发展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且吸引了许多学者对二元结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为基础，以劳动无限供

给为前提,将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与收入分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分析了一个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动力、过程与阶段。与以单一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为特征,以现有资源最优配置为研究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比,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理论模型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当时流行的凯恩斯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失业和经济危机为研究对象的,将资本主义失业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和对总需求进行管理来增加就业和消除危机。显然,凯恩斯理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产生弥补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不足,成功创立了发展经济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

1.1.2 国内背景

2011年是对中国^①城市化进程和流动人口管理都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当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上升了1.32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开始进入城市化后加速期;当年全国城市流动人口为2.3亿人。在2012年3月5日召开的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2012年实际经济增速7.8%,近8年以来增速首次低于8%,引发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政策走向的广泛关注。多年来,“保8”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指引,因为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不少人认为当中国GDP增速低于8%时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因此“保8”被视为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红线。而现实是,中国虽然每年都制定8%的增长目标,实际上都会“超额”完成,就连被认为最难“保8”的2009年,在“四万亿计划”等一揽子计划的刺激下,GDP也实现了9.2%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中国GDP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速10.7%(见图1-2)。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2012

^① 为便于数据统计和统一研究对象,本书所指的“中国”一般指中国大陆,不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年 GDP 已超过 50 万亿元)，如今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分量与过去相比已大不相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进入“深水区”后，改革发展的内涵和外延都出现了新变化。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 7%~8% 的“中速增长区间”。“十二五”期间，中国不再提 GDP 增长“保 8”的目标，而是设定年均 GDP 增长 7% 的新目标，就是出于经济中长期发展、开启战略性调整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规划主线考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由量的增长向质的发展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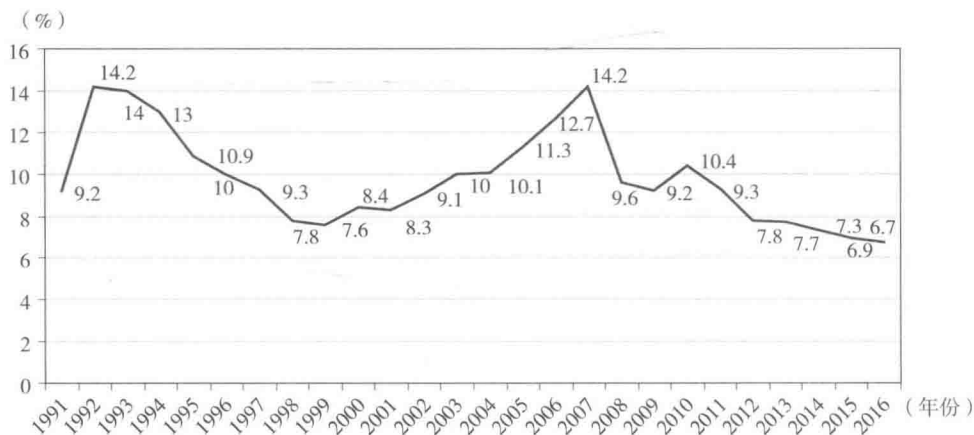


图 1-2 1991~2016 年中国 GDP 增速情况

中央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预期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在国家经济结构与国民待遇体系中，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在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应对二元经济结构，更加重视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积极构建以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要特色的新二元经济结构。

截至 2016 年末,中国总人口已达 13.8271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809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79298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35%,比上年末提高 1.25 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1.2%,比上年末提高 1.3 个百分点。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 2.92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 2.45 亿人。从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优化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产业加快转型升级(2012~2016 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如图 1-3 所示),城镇化加快推进,新兴市场加速扩容。同时,这也是一个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阶段,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如果迟迟没有找到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那么就潜藏着发展失速的极大可能,也就是所谓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符合中国国家结构的现状,有助于中国在克服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应对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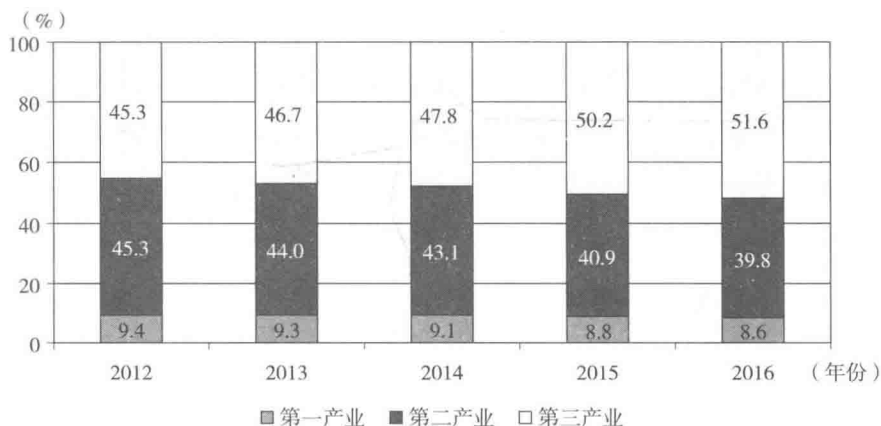


图 1-3 2012~2016 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人口结构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伴随着国内“婴儿潮”一代进入中年,国内人口出生率已经开始回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老龄化现象,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面临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人口增速的回落将带动



GDP 增速回落，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正如经济发达国家在经历人口高增长伴随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也呈现稳步回落的态势，这种回落并不是经济衰退的表现，而是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因此从人口结构因素层面来讲，现有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将有可能使得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回顾 2011 年以来各省市的 GDP 增速，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增速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西部省份增速都在 12% 以上，中部省份中增速最低的河南也达到了 11.7%。相比之下，东部沿海省份的增速普遍放缓。有专家指出，沿海某些地区增长放缓，固然受制于全球金融危机，外需下降，但新的增长点难觅，无力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人口红利的衰减，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释放出的制度能量逐步减弱等新状况，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产业升级换代缓慢、消费社会迟迟未能建立、人均收入得不到提升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较为明显的“中等收入陷阱”特征。中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这也是由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所以，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结构问题，从城乡关系角度切入更符合中国国情。

面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规模经济的实现越来越需要统一的大市场，要求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三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能够实现自由流动。然而，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都存在严重的分割现象，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流动人口虽然常住城市却无法全面享受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待遇。这样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无法真正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①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病愈演愈烈，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引发的中小城市发展迟缓，尤其是联系广大乡村地区的小城镇功能严重弱化，导致大量流动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政策一直是向工业和城市倾斜。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最终促

^①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成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化,反而造成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特征加强、转化进程迟滞。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世界大国,自身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与先发展的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简单地套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突出特征的主流发展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通过回顾和反思,我们认识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复杂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并系统谋划。

1.2 选题意义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来看,城市病是进入城市化加速期后所出现的阶段性发展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发达国家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差距一开始是显著扩大的,有一部分劳动者优先享受到发达地区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率先富裕起来。同时,在欠发达地区还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即使一部分人口流出,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也不一定会提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改善,由于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会趋向于收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城市结构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同步。认识城市多元待遇结构与二元经济结构、三元社会结构及其相关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仅是中国城市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 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中国顺应国际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有无一元经济?应对二元经济的方法是消除它吗?从目前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国外二元经济结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很多国家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有所谓的城乡统筹模式、新村运动模式、土地改革模式等。国外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改革目标不是彻底消除二元结构,而是尽量避免二元结构带来的弊病,使社会更和谐、人民更幸福。



(2) 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中国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能实现长期、快速、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或仅仅得益于若干权宜性举措，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崛起、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其中最为基础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通过小城镇建设，就近城市化，将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只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城市化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反映的是人口对高收入和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化对应的是人均 GDP 的不断提高。如果仅仅是户籍身份的转变，却没有对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更有效率的 GDP 产出，或者只有城市面积的扩张，却没有足够的就业增长作为支撑，这种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更会劳民伤财。

(3) 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应对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抓手。二元经济结构是当前中国主要矛盾的交汇处，也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解之题。从市场属性来看，资源要素总是自发地向高收益高回报的产业和区域配置，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快速推进时期，更容易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流入城市，存在着推动城乡差距扩大的内在动因。加强城乡统筹，目的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城乡互动、优势互补、共赢共赢。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绝不是城乡一样化、一律化。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是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改变当前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局面。

(4) 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三化同步以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战略思路，以推进城镇化为龙头，以提升工业化为动力，以加快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不断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

化新格局。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GDP 结构来看,目前不到 60%的人口城市化率与已经超过 90%的工业和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并不匹配,根据有关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10 个百分点。由于受到流动人口进城务工难以享受属地化公共服务待遇的政策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导致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规模是低于其最优水平的。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

(5) 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需要。在经历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同时还面临诸多难题,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缺失,资源瓶颈约束凸显等,如何平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制约、避免陷入“拉美陷阱”是我们在经历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中国想发挥大国的优势,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 GDP 的趋同,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迁徙自由。这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国家发展战略。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6) 破解或治理城市病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必然要求。经过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依托于国内低价的劳动力建立了工业化体系,经济总量上升的速度领先于全球,但是我们也遗留下过分依赖出口、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资源消耗过大等经济社会问题。当我们面对全球化之后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之时,我们突然发现以往赖以发展的低劳动力、出口以及资源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危机的到来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转变,由外延式增长向内生性增长转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

(7) 文化传承是破解或治理城市病并推动城市特色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作为反映城市鲜明特色和独特个性以及提高城市辨识度的核心要素,文化传承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方面。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各类文化资源,保持城市独特的结构特征和个性魅力,应对“千城一面”、城市衰落等



城市病，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化规划与城市规划的文化转向相适应，从产业效应、空间效应两方面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创意城市建设提供动力，有效应对了城市衰落带来的危机。西方国家文化规划发展模式在开展城市研究、推进城市更新、创新规划方法、整合发展要素、兼顾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城市转型升级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8) 重新评估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是避免城市病蔓延的现实需要。实践证明，将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作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病问题的关键，这条路并不可行。通过小城镇建设就近城市化，将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只是在表面上提高了城市化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在《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一书中提出了“大国大城”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大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显了规模经济的优势，比如分享固定投入、更好的劳动力市场匹配、获取人力资本外部性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而取消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割，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其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大城市转移，是提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所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6〕2125号）文件，特色小（城）镇包括特色小镇、小城镇两种形态。特色小镇主要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特色小城镇是指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单元，特色产业鲜明、具有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建制镇。特色小镇和小城镇相得益彰、互为支撑。发展美丽特色小（城）镇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转换，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未来特色小（城）镇能否承担起缓解城市病的重任，进而构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观察。